

科研单位,该驱哪门子邪

 本报评论员
戎国强


中科院说向“各界同仁”致歉,其实更应该向“科学”致歉,向“科学精神”致歉。

4月30日18时10分,认证为“中科院之声”的微博和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网站发布了一个“关于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启动仪式情况的说明”,就该启动仪式出现的作法驱邪仪式,向“各界同仁”致歉,并对两名有关工作人员作出停职处理。

中科院的科研项目与驱邪搞在一起,这事听起来就很讽刺,有损科研单位的形象,中科院有关领导不恼火倒奇了怪了。但是,对此事的检讨,不能止于科研单位的形象;还应该诘问一句:此事是否有损“科学”的形象?

曾几何时,“科学”在中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“长大要当科学家”就已经是很多少年儿童的理想。在那个崇尚科学的意识十分普遍的年代,科研项目的建设工地上出现神棍作法,是不可想象的。

不可想象的事情是怎么成为事实的呢?“中科院之声”发布的“说明”称此事“与科学

精神背离”;这个“科学精神”可能说到了要害。若干年来,全社会的科学精神是强化了,还是减弱了?至少有一部分人完全背弃了科学精神;其中对社会具有很大负面引导作用的是,一些级别不低的官员,崇尚“风水”,建机关大楼,布置办公室都要请“大师”看风水。在官员、名人的加持下,李一、王林之流混得风生水起,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。“科学”就这样被边缘化,“风水”则穿上了“传统文化”的外衣登堂入室。

科研与神棍搞到一起,并不是偶然的。照理,现代教育与求神拜佛也是格格不入的,但是,每逢高考前夕,一些学校会组织教师前往寺庙,烧香拜佛,求神灵保佑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,赐给学校一个好的升学率。一些老师说,烧香不一定是因为相信神灵,是求一个心安,求拜过了,心里踏实。这等于说,老师所掌握的知识,不能给自己心安,老师们的专业能力,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踏实。“知识就

是力量”变成了“神灵就是力量”。

人在什么时候会祈求神灵?自感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,最容易向偶像奉献膝盖。倒不是一定相信神灵,而是没有别的可以信靠。当知识不能给知识者力量的时候,知识者的社会地位,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知识(当然包括科学知识)的地位。当科学的形象受损时,科研单位的形象受损是必然的。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,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两位负责前期施工的工作人员,对“作法”一事失去了应有的“警惕性”也就有了必然性。尤其事发地点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甘肃武威,人都有入乡随俗的心理,身在现场,被现场气氛所裹挟,于是就犯了“未制止”的错误。

中科院说向“各界同仁”致歉,其实更应该向“科学”致歉,向“科学精神”致歉。把神棍驱走,处理了两名工作人员,中科院及全社会的“驱邪”任务还很重。尊重知识,驱走迷信,“科学”才能归位。

九价HPV疫苗8天过审,经验值得复制

 本报评论员
魏英杰


以往进口新药要求三期临床试验,出发点当然没错,只不过有些新药其实在境外已经上市,其安全性已经有足够保证,在审批上也就不能过于拘泥硬性规定。

对于广大女性来说,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九价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(HPV疫苗)上市,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。HPV疫苗有二价、四价、九价三种,用于预防HPV引起的宫颈癌,适用于16到26岁女性,有些国家和地区放宽至9-45岁。

有细心的媒体发现,这次批准距离制药商默沙东提交申请,只用了8天时间,简直是“火箭速度”。这事情我曾经关注过(详见2016年7月21日本报《宫颈癌疫苗十年之痒,呼唤“接轨”》),2016年7月有关部门批准了二价HPV疫苗在中国内地上市,次年又批准了四价HPV疫苗上市,而当时距离海外上市的时间已经整整迟了10年。

尴尬的是,这款疫苗在内地上市之时,恰是其在美国市场退市之日。从2016年4月起,四价疫苗在美开始停售,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开始只采购九价HPV疫苗。九价HPV疫苗可预防的病毒种类更多,在成本和价格得到控制后,停售其他HPV疫苗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这也意味着,在等了10年之后,内地女性还只能用上人家开始淘汰的疫

苗。在这次获批之前,许多内地人群以旅游入境的方式,选择到香港打九价HPV疫苗,花费更高不说,舟车劳顿也是免不了。

所以,这次国家药监局快速审批九价HPV疫苗,确实造福了广大女性人群。同时,这也让人思考:为什么这次审批时间那么快?像这样的审批速度,能否用于其他进口新药,让更多人群从中获益?

进口新药审批缓慢,这是个老话题了。有的原研药在国外上市后,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往往要在三五年以后,甚至耗时更长。这次九价HPV疫苗快速获批,的确有其特殊性。很重要的一点是,李克强总理近日听闻九价HPV疫苗尚未在内地上市,当即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审批。另外,收到相关进口注册申请后,国家药监局将其纳入优先评审程序,并基于之前四价疫苗获批数据的基础,有条件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,从而加快批准了产品的进口注册。

这就是说,九价疫苗获批,不仅有领导批示,而且走了“绿色通道”。那么,这是不是意味着,类似经验很难在其他进口新药上复

制?其实也不然。

以往进口新药审批慢,问题主要出在三期临床试验上。一些在国外已经上市的新药,在国内上市,仍需进行耗费时日的临床试验,再加上负责药品审批的人手不足等原因,导致审批效率奇低无比。对此,国家有关部门已意识到问题所在,去年10月份专门发文对进口药品注册有关政策进行调整。其中很重要一点,就是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完成后,可以直接提出药品上市注册申请。而从审批流程可看到,九价HPV疫苗的快速获批,也和临床试验这个环节的有条件豁免有关。

以往进口新药要求三期临床试验,出发点当然没错,只不过有些新药其实在境外已经上市,其安全性已经有足够保证,在审批上也就不能过于拘泥硬性规定。就此而言,九价疫苗快速获批的经验,或可应用于其他新药进口的注册审批上。据不完全统计,2017年全球排名前20位的肿瘤药,至少有8种药品尚未在中国内地上市,如果在严格把关的同时,根据具体情形加快审批,那对国内患者将是更大的福音。

“后来的我们”,期待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

 本报评论员
高路


在一个已经需要拼专业程度拼分工拼合作的行业里,我们的市场上却遍地都是跨界的神话,这可能吗?

刘若英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上映之日,也是风波乍起之时。不少影院反映,在开场前出现大量集中退票情况,引起行业震动。电影局初步认定该影片退票情况确有异常,具体问题尚待研判,一旦发现查明,将严肃处理。刘若英工作室也发布声明,将积极协助配合相关部门查明真相。

真相大致是什么,恐怕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票房、上座率、网络评分,这些能左右票房的关键因素,同时也是造假的重灾区。先订后退,这在算不得什么高超的手法了,在此之前,有不少片子用过这一招,有人票房造假,营造虚假的繁荣,也有人刷分造假,营造虚假的口碑,唯一的目的是把观众往电影院里骗。这些人很可恶,这些人又很可怜,他们可能是营销高手、骗术的行家,却是影视剧行业的破坏者。

一个靠炒作推动的市场和一个靠质量推

动的市场,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靠影星驱动,靠炒作驱动的市场里,用尽各种办法制造热点几乎是必然出现的现象,所以,影片上映之前总是会闹出点风波,或正或反,有急于申诉不明之冤的,也有贼喊捉贼的,好的炒,不好的也炒,总之就是想办法制造话题,吸引眼球,甚至不惜自黑,没有话题制造话题也要上。影视市场蛋糕实在太大,哪怕只是割走一点,都不是小数目。短平快,抢在口碑倒掉之前先收割一茬,也就成了很多电影的必由之路。当然,口碑和网络评分最终会让这些影片现出原形,问题是这需要时间,当定论形成以后,往往票房已经取得。这个时候,指责批评仿佛是为它开庆功宴。

电影市场里的各种乱象,归根结底还是好片子太少了,国产片中能让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片子更是凤毛麟角。这几年,情况有所好转,但影片质量还难言满意,影片类型还

过于单一,这给烂片不断出现提供了生存空间。一方面城市在扩大,新落成的电影院越来越多,电影市场急剧扩张,电影市场某种程度上说也成了刚需,另一方面,影片质量又跟不上,好片子一片难求,于是,一些质量一般的影片也取得了与其质量不相称的票房业绩。

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口碑,观众对整体制作水平抱有怀疑,这就给炒作留下了空间。专业的人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素质,所以,才有这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跨界上,指望他们带来一股清新之风。事实证明,这并不靠谱,在一个已经需要拼专业程度拼分工拼合作的行业里,我们的市场上却遍地都是跨界的神话,这可能吗?

在这次事件中,管理部门应该好好地查查,但这只是治标之举,更重要的还是斩断低质电影的变现之路,与其让烂片当道,让市场迷失在低水平的竞争中,不如引入更多的竞争者。